

丝 绸 之 路 与 敦 煌 文 化 丛 书



敦煌文化探微

赵声良 戴春阳 张元林 著
敦煌研究院 编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卷之二

卷之二



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70周年



敦煌文化探微

赵声良 敦煌研究院 编
戴春阳 著
张元林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文化探微 / 敦煌研究院编. — 南京: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014.10

(敦煌文化与丝绸之路丛书)

ISBN 978-7-5344-7901-4

I. ①敦… II. ①敦… III. ①敦煌学—研究 IV. ①K8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13995号

选题策划 毛晓剑

项目统筹 程继贤

责任编辑 郭 渊

龚 婷

曲闵民

装帧设计 毛晓剑

曲闵民

责任校对 吕猛进

责任监印 贲 炜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美术出版社(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mscbs.com.cn>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制 版 南京新华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精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mm×1000mm 1/16

印 张 11.75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44-7901-4

定 价 58.00元

营销部电话 025-68155677 68155670 营销部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江苏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丛书总序

樊锦诗



丝绸之路，是中古时期一条曾经对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过重大作用的国际通道。从中国中部的都市长安向西，经过无数的山川与城市，穿越沙漠、戈壁与绿洲，一直通向地中海的东岸，丝绸之路沿线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就因丝绸之路的发达而得到促进。其中，位于我国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无疑是丝绸之路上最受瞩目的一颗明星。自汉代设郡以来，敦煌成为总辖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由敦煌向东，经河西走廊，可达汉唐古都长安、洛阳；向西通过西域（现我国新疆地区），可进入中亚、西亚、南亚，乃至欧洲的罗马；向北翻过马鬃山，可到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向南越过阿尔金山，可接唐蕃古道。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特殊地位，使它在欧亚文明互动、中原民族和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公元4至14世纪，古敦煌地区受到佛教的影响，古代艺术家们在此建造了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等一批佛教石窟，我们统称为敦煌石窟。通过敦煌石窟和敦煌藏经洞的出土文物，使我们了解到欧亚文明互动、中原民族和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特别是在中古时期，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文化在此汇流，羌戎、乌孙、月氏、匈奴、鲜卑、吐谷浑、吐蕃、回鹘、粟特、于阗、党项羌、蒙古、汉等民族的历史文化状况；中原的儒教和道教、印度的佛教、波斯的摩尼教、粟



特人的祆教（拜火教）以及西方早期基督教中的景教等宗教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发展状况；公元4至14世纪1000多年间佛教艺术的流传及演变等等丰富的历史。

敦煌文化的兴衰，又与丝绸之路的繁荣与衰落息息相关。自汉代以来，丝绸之路的开辟以及长期的繁荣，给中西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位于丝绸之路要道的敦煌便在东方与西方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中，发展了自身独特的文化艺术，保存至今的敦煌石窟艺术以及藏经洞出土的卷帙浩繁的大量文献，就蕴藏着无限丰富的古代宗教、文学、历史、音乐、美术等等丰富的遗产，成为今天学者、艺术家、旅游者瞩目的对象。

古代敦煌文化之所以得以繁荣，正是由于汲取了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的丰富营养。今天，我们又处于一个中外文化交流的大好时机，更应该以开阔的胸襟，放眼世界，从更广更深的角度来看待丝绸之路与敦煌的文化艺术。“丝绸之路与敦煌文化丛书”就是希望以更新的视角、更新的方法来探讨丝绸之路与敦煌学的相关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不能再局限于书斋之中，更应该考虑到对社会的责任，要尽可能地把学术研究的成果转化成普通读者的精神食粮，为当今的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要让更多的非专业人士也对敦煌、丝绸之路这样的古代文明感兴趣，并从中得到收益。这也是我们今天学术研究者的责任。



敦煌文化探微

主 编

樊锦诗

副主编

赵声良

撰 稿 赵声良 戴春阳 张元林

摄 影 吴 健 孙志军 孙洪才

乔兆福 余生吉 赵声良

目 录

第一章 敦煌文化概述	1
第一节 地域文化与世界显学	2
第二节 敦煌文化的历史地理背景	3
第三节 敦煌文化的内涵、特点与价值	6
第二章 宗教文化	15
第一节 佛教	16
第二节 道教	28
第三节 祆教、摩尼教、景教	29
第三章 社会生活	33
第一节 学术与教育	34
第二节 体育	36
第三节 衣食住行	39
第四节 商业	45
第五节 民俗	45
第四章 文学	51
第五章 艺术	57
第一节 敦煌彩塑	58
第二节 敦煌壁画的主要内容	66
第三节 敦煌壁画的艺术风格	82
第四节 藏经洞出土绘画	90
第五节 敦煌写本书法	92

第六节 音乐舞蹈	94
第六章 科学技术.....	99
第一节 建筑	100
第二节 度量衡	121
第三节 天文 历法 数学 地理	125
第四节 医疗卫生	133
第五节 农业	137
第六节 手工业技术	142
第七节 交通工具	148
第八节 造纸、印刷与装帧	150
第七章 多元文化的敦煌.....	155
第一节 华戎交汇	156
第二节 多民族交融	159
第三节 胡风东渐	161
第八章 敦煌的启示.....	165
第一节 艺术家的圣地	166
第二节 《丝路花雨》与“敦煌舞”	170
第三节 今天我们如何弘扬敦煌文化	171
参考文献	174
后记	178

第一章 敦煌文化概述

第一章

敦煌文化概述

敦煌自汉武开疆立郡，便成为汉王朝的西陲门户，其连通东西的特殊位置，使之成为丝路上的通都要邑和东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个交融点。开放包容的文化土壤，成就了连续千年的佛教艺术圣地；特殊的气候条件，保全了博大精深的中古文化典籍宝藏。一经开启，虽仅以边郡地域冠名，但深邃灿烂的文化基因，迅即使之成为世界文明的象征；正是这样的文化奇迹，使之成为世界“显学”；它的内涵虽是历史，但探索和研究使之不断充实和更新——这就是敦煌文化！也是它的真谛和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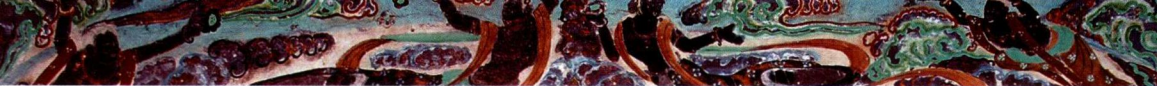
第一节 地域文化与世界显学

敦煌学为世界显学，在学术界早已成为没有异议的共识。我们知道，敦煌学是指国际上以敦煌地区古代遗迹（石窟）、遗物（以藏经洞出土文物为核心的各类文物）、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含河西、高昌）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它具有不断深化、丰富的特质。

敦煌文化作为以地冠名的地域文化是指敦煌地区各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由此可见，其核心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因而，伴随着敦煌学研究的不断深化，“敦煌文化”已成为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成为众多学科探究、阐发、争鸣的对象。

敦煌文化虽然属于地域文化，但上述载体所承载的博大精深的精神财富，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字（汉、藏、梵、吐火罗、回鹘、于阗、粟特、西夏等）、文学、学术思想、宗教信仰、道德情操、石窟（雕塑、绘画、书法）艺术、科学技术、风俗习惯、各种典章制度等百科全书式的文化遗产，无不体现和代表了其时中华文明和异域文明的最新成果和先进文化。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敦煌文化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化遗产并实际具有世界文明的象征意义。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从上世纪上半叶开始，以伯希和、王国维、陈寅恪等为代表的中西方文化大师对敦煌文化的关注和研究热情；以常书鸿为代表的艺术翘



楚在游学巴黎专攻油画时偶见敦煌艺术作品后即毅然回国、半生坚守保护敦煌石窟的执着；以樊锦诗等为代表的几代“敦煌儿女”对敦煌文化不仅投以美好青春年华并作为一生的无悔追求。

不仅如此，即便一般慕名来敦煌参观或从其他途径得览精美绝伦的敦煌壁画的各界人士与朋友，在无不叹为观止和更欲得窥敦煌文化富于传奇的堂奥的同时，许多朋友都在思考、追问：以今天看亦属僻远汉唐更为边鄙的敦煌，为什么会成就如此绝无仅有的文化伟业？而这无疑是我们应该回答的基础性问题。

第二节 敦煌文化的历史地理背景

敦煌马圈湾、南湖等地的考古文化遗存表明，早在公元前 2000 年前后，属于青铜时代的四坝文化火烧沟类型的先民，就已经开始了对敦煌地区的开发，他们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他们烧制的彩陶带有鲜明的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及青铜时代齐家文化的典型装饰风格，而他们使用的三角形器盖和铜制品以及铜、陶质权杖头则又与中亚、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具有紧密联系，小麦的种植则不能不将我们的视线引向小麦的原产地西亚。在这样的背景下，殷墟妇好墓出土了大量用和田玉雕琢的精美玉器就很好理解了。春秋战国时期，月氏、匈奴等游牧民族相继在这里活动。公元前 121 年汉武帝开疆扩土，敦煌地区正式纳入汉王朝版图，为西域的经营奠定了基础，进而使中西交流成为汉王朝的国家行为。公元前 111 年设敦煌郡以后，犯官、戍卒、贫民、刑徒等中原移民构成敦煌居民的主体，其中不乏内地的世家大族。如 P.2625《敦煌名族志·索氏》载：

汉武帝时，太中大夫索抚、丞相赵周直谏忤旨，徙边，以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从钜鹿南和迁于敦煌。凡有二祖，号南索、北索。初索抚在东，居钜鹿之北，号为北索；至王莽天凤三年（公元 16 年），鸣开都尉索骏复西敦煌，骏在东，居钜鹿之南，号为南索。莫知其长幼，咸累代官族。

又如《颌阳令曹全碑》谓曹全“敦煌效谷人也”，述其先祖称：

其先盖周之冑，武王秉乾之机，翦伐殷商，既定尔勋。福禄攸同，封弟叔振铎于曹国，因氏焉。秦汉之际，曹参夹辅王室。世宗廓土斥竟（境），子孙迁于雍州之郊，分止右扶风，或在安定，或处武都，或居陇西，或家敦煌。枝分叶布，所在为雄^[1]。

限于篇幅，以上所举无疑仅为其中荦荦大者。这些世代居住在河北、陕西而迁居敦煌的世家大族，他们深厚的中原传统文化底蕴及所带来的先进的中原文化成果构成

【1】《汉曹全碑》（故宫博物院拓本影印），文物出版社，1982年。



与中原文化同步的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基础，而与当地少量原居民（实际上是更早的游牧移民）所积淀的与西域、中亚千丝万缕的文化因素和谐共处，共同构成了坚实的汉晋敦煌文化土壤。而这种以移民为主体的居民构成特点及在新迁地域披荆斩棘共克时艰的共同开发经历，使得他们较少拘泥于区域的异同，而更富于相互理解和包容，终于形成这一地区自觉的包容并蓄的文化基因。这样就使汉族与月氏、匈奴遗绪及以后与鲜卑、粟特、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和平共处成为常态。

敦煌，地处河西走廊西端，西邻西域。丝绸之路开通后，自西海（地中海、里海）东行经西域门户伊吾、高昌、鄯善三道“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2]。作为汉王朝的西部边陲，敦煌所具有的控扼东西交通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它成为汉王朝经略西域的桥头堡（图 1-1）。而两汉之际，西域又正是佛教东传的前进基地。

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西汉昭帝（公元前 87 年—公元前 74 年）以后的简牍表明，悬泉置驿站的一个重要职能是接待西域诸国来华使节，曾接待过来往于汉廷和西域之间的大月氏、康居、龟兹、罽宾、大宛、乌孙、于阗、精绝等 29 国使节^[3]。汉末三国间来华的著名译经高僧、居士安世高、安玄、支楼迦讖、支谦、康巨、康孟详、康僧会、白延等正是分别来自于西域的安息、大月氏、康居、龟兹等国^[4]。而“大月氏王使伊存口传浮屠经”的历史记载，表明早在西汉哀帝时期（公元前 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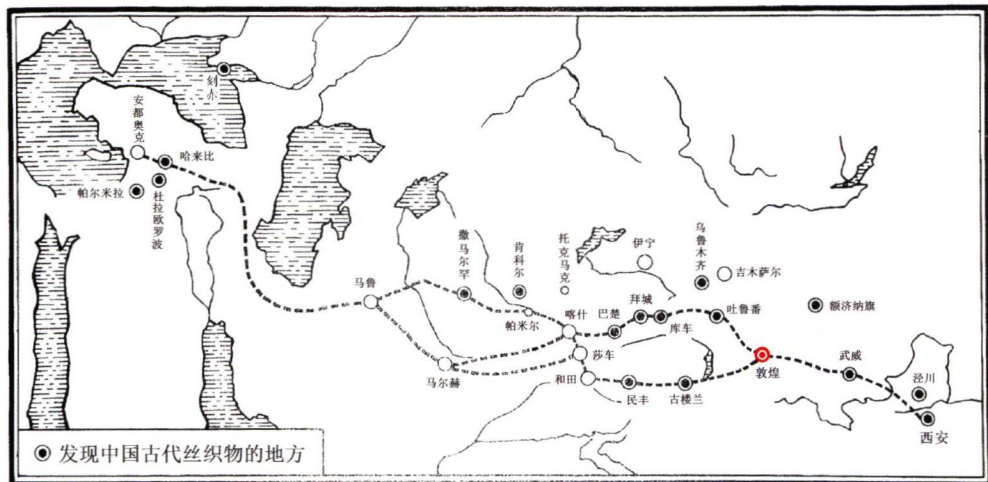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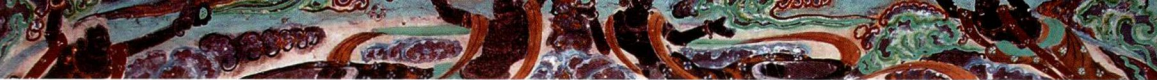


图1-1 丝绸之路示意图

【2】裴矩《西域图记·序》，见《隋书·裴矩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579、1580页。

【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文物》，2000年，第5期，第21—25页。

【4】分别见释慧皎《高僧传》《大正藏》第50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324页；释僧佑《出三藏记集》《大正藏》第55册，第95—97页；释靖迈《古今译经图记》《大正藏》第55册，第350页；智升《开元释教录》《大正藏》第55册，第487页。



前1年),作为西域社会上层的使节本身,实际成为东向传播佛教的先驱。西晋太康五年(公元284年)敦煌菩萨竺法护返敦煌,仍从龟兹副使关子侯处得到《不退转法轮经》并译为汉文,可见使节传法可谓传统。更不用说大量东向弘法的一般僧侣与兼通东西的译经高僧了。

1991年敦煌悬泉置遗址考古发掘出土一枚以“浮屠”作为地名的简牒 VI 91DXF13C ②:30:

少酒薄乐,弟子谭堂再拜请。会月廿三日,小浮屠里七门西人。

浮屠/佛塔,实质上是佛教寺院的象征和标志;“里”,是古代社会居民的基层管理组织。敦煌在东汉明帝时期就将“浮屠”这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指向的外来词语用作地名,表明当地居民对佛教文化的坦然和安之若素,可见敦煌作为汉王朝西陲郡治,已成为了解异域文明的窗口和文化交融的首善之区。三国魏时,天竺沙门竺高座在敦煌“立寺”宣讲佛教。慧皎《高僧传》所录后汉到西晋时期的高僧17人,其中敦煌籍或与敦煌有密切关系的高僧有竺高座、竺法护、竺法乘、于道邃4人,比例近1/4。由此可见佛教入华早期在敦煌习学和传播的盛况。

需要注意的是,精通汉语和梵文的竺法护游历西域诸国,带回大量梵经,在东返经敦煌到长安的路上译为汉文。他所译写的大量佛经“广流中华”。其年届55岁以后,虽“声盖四远”,仍不惮疲苦,两次西赴敦煌,先后从罽宾文士竺侯征、龟兹副使关子侯等人手中再获新经,在敦煌又相继翻译了《修行道地经》《阿维越遮致经》及《正法华经》等。当时从西域携经来华的各色人等,于敦煌或暂驻或定居;此外敦煌还聚集了大量来自印度、西域的“沙门”、“居士”,竺法护译经时常与他们“参校”切磋;本地的大量汉族居民也相互“劝助”,共襄译经盛事。可见在敦煌可低成本(时间、空间)地进行佛教文化交流。这一现象表明西晋时期敦煌已成为佛法聚集和东进的重要基地。

中国现存四大石窟中,云冈、龙门石窟皆为北魏孝文帝所置,其虽均地处京都,但因人置废,故都具有很强的时段性。麦积山石窟最得山水地利灵秀,自是禅僧遁世隐修的不二之选。而敦煌是河西诸绿洲中为戈壁环绕的最小的绿洲,其经济实力与帝都及开发较早的甘肃东部相较,差距之大不可以道里计;较之河西东邻的武威、张掖、酒泉诸绿洲,亦难望其项背。其生态环境、自然条件不要说与山奇林郁、石静溪幽的甘肃东部相比,即便与河西走廊东部相比亦不占优。然而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自东而来的“沙门乐傅杖锡西游至此(鸣沙山)……架空镌岩”^[5],“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营建“伽蓝”^[6]。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西游、东来之僧不惮跋疐涉沙,独垂青于敦煌呢?

【5】敦煌研究院《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72页。

【6】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武周圣历李君莫高窟佛龕碑合校》,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65页。



撩开乐僔于此“忽见金光，状有千佛”及法良所见“诸多神异”的神化面纱，真实的答案只能是——适宜的文化生态环境。可以说，正是敦煌地区这样特定的连接东西、沟通中外的文化窗口功能及 300 多年佛教文化的浸润所积淀的丰沃的佛教文化乐土，促使乐僔、法良肇始于此“架空镌岩”；尽管敦煌地区此后亦屡历兵燹甚至异族役治，最终仍然成就垂 1000 余年各朝开窟不辍、历代造像迭新的特殊佛教圣地和以中古文书为核心及与其他各类文物所构成的优秀人类文化遗产。

第三节 敦煌文化的内涵、特点与价值

伴随着上世纪初敦煌石窟藏经洞文献的发现和传播，在中国文化的谱系中催生了举世瞩目的“敦煌学”，从而使敦煌走向了世界。

敦煌文化的内涵非常广泛，作为以地冠名的地域文化，其核心无疑应以最有代表性的敦煌石窟群（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东千佛洞及肃北五个庙石窟等）的石窟考古、石窟艺术以及藏经洞文献的综合研究为标志（图 1-2、图 1-3）。



图1-2 敦煌莫高窟外景



图1-3 瓜州榆林窟外景

敦煌石窟群，是在敦煌地区厚重的汉晋传统文化土壤中滋养生发的东土佛教石窟艺术奇葩。石窟本身既是僧众参禅悟道的特定场所，也是佛教艺术的重要载体。仅就石窟而言，虽然石窟并非敦煌独有，但敦煌石窟自十六国时期至元代，历朝历代持续开窟造像，纵贯千年。这种具有不同时代烙印、不同民族风格、不同文化（狭义）特点的连续性的遗存本身，在人类历史上却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迹。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敦煌停留的传教僧侣使节，大多学贯东西，既有深厚的佛教造诣，又熟知汉文化真谛、异域普罗大众文化心理特点。他们深知艺术所特有的穿越种族、文化的强烈感染功能，基于敦煌地区以莫高窟为代表的一些便于开窟造像的地点不利于雕刻的地质岩性特征，他们选择了更便于表达丰富曲折的佛教义理的壁画形式，并最终成就了功垂千古的敦煌石窟壁画。

为吸引信众，弘法僧侣组织画师尽可能地把深奥、抽象的佛教史迹、经义以故事性极强的故事画的形式绘于洞窟壁面，于耳濡目染之间，浸润人们的心灵，宣扬佛理。因此壁画内容极为丰富、情节生动感人，它首先以精美的形象吸引人、浓郁的生活气息贴近人、鲜明的佛教主题教化人。如经变画中许多多姿多彩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生产、生活场景，瞬间便拉近了与观者的距离；美轮美奂的亭台楼阁、亦真亦幻的玉宇琼苑所象征的神圣的佛国净土极乐世界，引发人们美好的向往和热



烈的追求；栩栩如生的佛传、本生、因缘故事，则劝人行善向佛。而这一地区贯通东西的地理位置、敦煌文化兼容并蓄的文化基因，使得东来西进代表各个时期不同地区、文化的最新画风和流派的画作粉本（画稿），源源不断地集汇于敦煌。如以展子虔、阎立本、吴道子等中古帝都画坛巨匠为代表的京都画风，很快在隋代第419窟、420窟，初唐第220窟，盛唐第103窟等石窟壁画中得以体现；于阗瑞像、吐蕃占领期的印度波罗密教艺术则是中晚唐开始出现的新风尚。以致仅现在能看到的敦煌石窟群壁画就达5万多平方米，是世界上壁画最多的石窟群，基本体现了中古时期各个历史阶段绘画艺术的最高水平及艺术特点。

揭开佛教教义的神秘帷幢，敦煌壁画丰富多彩的佛国世界又正是当时现实世界的真实折射。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从繁盛神秘的宗教文化的背景下，所看到的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民俗节庆、婚丧嫁娶、喜怒哀乐等人生百态，就不再有时间的距离而可以直接对话——农作图中的满足和亲切、嫁娶图中的喜悦和热烈等；建筑、服饰、用具、工具等具有不同时代烙印的物质造型，则似乎触手可及、可感可知——普通民居的朴实可信、帝都崇楼的天国蓝本，从而构成了敦煌中古时期活灵活现连续的社会文化发展演变图谱。因而壁画所包含和直接反映的历史、民族、文化、教育、经济、建筑、科技、民俗、生产生活、医疗卫生、东西交流、汉晋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的关系、寺院、宗教、宗教流派、参禅仪轨、石窟形制、石窟（壁画、雕塑）艺术、世族关系、供养方式等丰富内涵，就不再是抽象的概念，它们不仅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东西文明交融的文化宝藏，同时还具有现代文明的博物馆功能。

还要注意的是，石窟营建过程中由于开窟家族功德供养等需要，导致后人对前人所开洞窟的维修、扩建及重修，从而形成大量后期壁画覆盖前期壁画的现象，即敦煌石窟还具有遗址层累叠压的性质。而现存表面壁画的重大文物价值，却不可能像遗址那样去挖掘揭露，因而被叠压的早期壁画的探索认识只能期待以科学技术手段，既充分保护现存洞窟又可认知更多的未知之谜。从这个角度来说，敦煌石窟本身还具有原生遗址博物馆的性质。由此，则敦煌文化的内涵将不断被充实，我们对之的认识也将不断被更新。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对敦煌石窟的综合性文物保护的新学科、近年敦煌北区考古发掘的许多重要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成果等等，无不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而正在进行中的具有前瞻意义的“数字敦煌”的建设等，也必将促发新的学术研究方向。

在敦煌文献中，仅藏经洞出土文献就达5万多件，上起西晋永兴二年（公元305年），下至北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加上敦煌石窟北区近年考古出土的西夏文、回鹘文、藏文、蒙文（含八思巴文）、梵文（含婆罗迷文）元代佛教典籍以及叙利亚文《圣经》摘录等文献，它的起迄上下限与敦煌石窟的开凿基本同步，

